

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博鳌亚洲论坛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1134-956-6

I. ①博… II. III. ①经济一体化 - 研究报告 - 亚洲
- 2011 IV. ①F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5905 号

© 2011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1 年度报告

责任编辑: 郭华良 汪 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成品尺寸: 215mm × 278mm 6.75 印张 171 千字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34-956-6

定价: 125.00 元

编写说明及致谢

本年度报告由林桂军、王家骅担任主编，在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姚望的指导下完成。感谢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先生为本书写作给予的指导并撰写了序言。

在林桂军和王家骅的领导下，承担本报告编写任务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该中心通过其全球研究网络，组成了一支包括各国相关领域专家的写作团队，完成了本报告的撰写。所有团队成员展示出极佳的合作和奉献精神以及精湛的专业素养。作者名单如下：

林桂军，总撰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王家骅，总撰稿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江学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亚太经济学会会长，中国

樊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Christopher Findlay，阿德莱德大学，澳大利亚

Alicia García-Herrero，西班牙对外银行（香港），中国香港

何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洪俊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Locknie Hsu，新加坡管理大学，新加坡

黄晓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Hiep Nguyen，岘港大学，越南

Nguyen Chuong Ong，岘港大学，越南

Kiyotaka Sato，横浜国立大学，日本

Stephen Schwartz，西班牙对外银行（香港），中国香港

殷晓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张艳，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在编写过程中，邓士专、黄灿、荆然、李秀娥、裴建锁、王春蕊、王乐恒、肖夏、周骅骅等对数据搜集和分析提供了大力协助。他们的努力和耐心使得本报告的内容翔实而充分。本报告的中文版由赵忠秀担任总编，孙靓莹协助做了大量的翻译、审校和修订工作。陆勇担任俄文版的总审校工作。西村友作担任日文版的总审校工作；山下阳子协助做了大量的翻译、审校和修订工作。

本报告并不必然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观点和政策，其中的问题和不当之处，均由本报告的编写者负责。

我们非常感谢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仔细审读本报告初稿。他们是：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张燕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裴长洪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谷源洋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教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汤敏副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王跃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周晓晶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王军研究员。他们的真知灼见对本报告的写作极具价值。

我们向为本报告贡献了辛勤和创造性工作的上述成员表示衷心感谢。上述人士中还包括来自亚洲开发银行的各位专家，他们对本报告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亚洲开发银行为本报告提供了资金支持和相关帮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 工程”项目也向本报告提供了资金支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承担了本报告的出版工作。对于以上机构和人士，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序 言

2010 年亚洲经历了振奋人心的一年，地区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 7%，超过了该地区许多经济体之前预测的增长率。在去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度报告《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2009 年度报告》中，亚洲被认为是世界复苏增长之路的领导者。与美国和欧洲的缓慢恢复之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 年亚洲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45%。2007 年下半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的负面影响正快速消失。

亚洲增长模式曾被认为是严重依靠外部需求拉动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外部需求的急剧下降曾引发人们普遍的悲观看法，认为亚洲经济的未来发展将难以为继。然而，亚洲通过多方努力正在快速摆脱危机，尽力将发达国家传导出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财政刺激计划、宽松的货币政策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增长。除此之外，还有两项重要因素在亚洲各经济体的恢复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首先，在出口仍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民间消费和投资对于拉动增长的作用正日益扩大。其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和相互依存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09 年和 2010 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显著增长，对美国和欧盟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有积极迹象显示，除了传统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外，亚洲各经济体也成功地扩大了与其他区域外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贸易国。中国和印度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 10%，这也刺激和带动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长。

我们欣喜地发现，亚洲各经济体之间的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加强，这不仅仅是由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个人、企业和政府在一系列议题上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也是有利的助推器，进一步带动了该地区的持续增长、繁荣和稳定。

在取得令人瞩目成绩的同时，亚洲各经济体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在 2010 年下半年和 2011 年年初，亚洲地区开始出现经济过热的苗头。亚洲经济的稳健复苏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此外，食品价格攀升，由于中东地区混乱局势所引发的世界石油供应动荡都对该地区的价格稳定形成威胁。亚洲各国政

府应该重视正不断蔓延的通货膨胀问题。

到目前为止，亚洲在服务贸易方面取得的成绩还远不能与货物贸易相提并论。事实上，亚洲服务贸易在未来有着巨大的增长潜力。2009年，亚洲服务贸易出口额仅占亚洲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15.9%，而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1.6%。在运输服务和电信服务方面，亚洲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次区域和各国基础设施条件差异明显。目前亚洲在该领域已取得的成绩主要是由市场引导并由软性基础设施驱动。跨境运输和电信服务贸易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有待于区域合作的加强。最后，亚洲经济一体化主要集中于货物贸易，金融一体化仍需时日加以完善。贸易一体化和金融格局的不对称发展已经引起有关各方的关注，其对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需要进行进一步调研。

博鳌亚洲论坛一贯致力于提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最新信息和观点，本报告是这一努力的结晶。我向负责起草报告的由各国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表示感谢。为了扩大本报告的影响并引发人们对亚洲转型问题的关注，本年度报告将同时发行英文版、中文版、日文版和俄文版。希望通过我们的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更多的讨论，并得到更多的指导意见，以使今后的这份报告写得更好。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周文重

Contents

编写说明及致谢	IX
序言	XI
第 1 章 背景：“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1
1.1 “新区域主义”兴起的事实	1
1.2 “新区域主义”兴起的原因	3
1.3 “新区域主义”兴起带来的顾虑	5
1.4 政府间合作及区域经济一体化	6
第 2 章 国际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9
2.1 亚洲对外贸易的特征	9
2.2 更加依赖邻居：相互依存指数	17
第 3 章 国际直接投资与亚洲经济一体化	19
3.1 国际直接投资流入	19
3.2 国际直接投资流出	22
3.3 亚洲投资条约的新近发展	25
3.4 谁是亚洲经济体最重要的投资伙伴？	29
第 4 章 增长与经济周期的同步化	33
4.1 2010 年亚洲经济增长的回顾：稳步的 V 型复苏	33
4.2 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情况	37
4.3 亚洲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增长的同步化	44
第 5 章 一体化进程中的亚洲旅游和服务贸易	47
5.1 亚洲服务贸易	47

5.2 亚洲旅游贸易	58
5.3 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服务贸易：WTO 的未来何在？	60

第 6 章 跨境运输和通讯对一体化的贡献 63

6.1 背景：关注一个联络更为通畅的亚洲	63
6.2 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增强与合作的必要性	63
6.3 运输与通讯行业的区域广泛合作	68
6.4 总结	71

第 7 章 金融一体化 73

7.1 如何衡量全球金融一体化程度	73
7.2 资本流动和区域金融一体化	74
7.3 金融一体化实证	78
7.4 金融一体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83
7.5 区域货币一体化及合作的前景	84

第 8 章 总结与展望 89

参考文献 91

表目录

List of Tables

表 2.1	2010 年 1~8 月部分亚洲经济体以及澳大利亚区域内货物贸易额	10
表 2.2	亚洲次区域货物贸易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重	13
表 2.3	2009 年亚洲十大经济体	13
表 2.4	2009 年中国主要出口货物及主要目的地	14
表 2.5	2009 年日本主要出口货物及主要目的地	16
表 2.6	200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间贸易依存度指标	17
表 2.7	1999 年、2004 年及 200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指标	18
表 3.1	2005~2010 年亚洲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	19
表 3.2	部分经济体跨国并购出售额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额之比	21
表 3.3	2008~200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及与流入额之比	22
表 3.4	部分经济体跨国并购购买额及与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额之比	24
表 3.5	2008~2010 年亚洲部分经济体投资协定举例	26
表 3.6	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与其他经济体 FDI 平均相互依存度 (东道国角度)	30
表 3.7	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与其他经济体平均 FDI 相互依存度 (母国角度)	31
表 5.1	1982~2009 年亚洲服务出口情况	48
表 5.2	1982~2009 年亚洲服务进口情况	50
表 5.3	2006~2009 年中国服务业内向 FDI	51
表 5.4	2008~2009 年印度服务业内向 FDI	52
表 5.5	2000~2009 年亚洲分产业服务贸易差额	53
表 5.6	2003~2008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 RCA 指数	56
表 5.7	2000~2008 年中国 RCA 指数	57
表 5.8	2000~2008 年印度 RCA 指数	57
表 5.9	亚太旅游抵达人数	58
表 5.10	国际旅游支出世界前十大经济体	59
表 6.1	亚洲次区域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和海港数量	64
表 6.2	基础设施环境分项指数和部分亚洲经济体的所选指标	66
表 6.3	所选亚洲经济体促进贸易指数排名, 2010	67
表 6.4	所选亚洲经济体旅游竞争力指数排名, 2009	67
表 7.1	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银行国际债权	76
表 7.2	2001 年和 2009 年亚洲地区投资组合矩阵	79

表 7.3 (a)	2000 ~2005 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相关性矩阵	81
表 7.3 (b)	2006 ~2010 年股票市场价格指数相关性矩阵	81
表 7.4	三个时期亚洲经济体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关系	82
表 7.5	费尔德斯坦—掘田之谜的经验结果	83
表 7.6	美元在亚洲各经济体汇率政策中的隐含权重	87

图目录

List of Figures

图 1.1	快速发展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2
图 1.2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与 FTA 伙伴的贸易比重	3
图 1.3	海峡两岸的收入与贸易	8
图 2.1	2009 年亚洲出口市场分布情况	11
图 2.2	2009 年亚洲进口区域分布图	11
图 2.3	1999 ~2009 年亚洲区域内进口和出口所占比重	11
图 2.4	1999 ~2009 年亚洲出口份额	12
图 2.5	1999 ~2009 年亚洲进口份额	12
图 2.6	1999 ~2009 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额	14
图 4.1	亚洲引领世界复苏	33
图 4.2	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34
图 4.3	亚洲增长贡献度分析	34
图 4.4	亚洲进出口增长率	35
图 4.5	财政刺激政策：亚洲的反危机措施	36
图 4.6	亚洲的资本流入	36
图 4.7	亚洲的通胀已现反弹	37
图 4.8	中国：增长的贡献度	38
图 4.9	印度：增长的贡献度	39
图 4.10	中国香港：增长的贡献度	40
图 4.11	中国台北：增长的贡献度	41
图 4.12	韩国：增长的贡献度	41
图 4.13	新加坡：增长的贡献度	42
图 4.14	印尼：增长的贡献度	42
图 4.15	马来西亚：增长的贡献度	43
图 4.16	菲律宾：增长的贡献度	43
图 4.17	泰国：增长的贡献度	44
图 4.18	日本：增长的贡献度	45
图 4.19	澳大利亚：增长的贡献度	45
图 4.20	亚洲区域内增长的同步性	46
图 5.1	1980 ~2009 年亚洲与世界服务出口	47
图 5.2	2004 ~2009 年亚洲与世界服务出口的增长率	48
图 6.1	亚洲和世界公路与铁路里程合计	64

图 6.2	亚洲注册商船队运能	65
图 6.3	亚洲次区域航空运输, 注册承运人出港量	65
图 7.1	1980 ~2008 年亚洲和发达国家法定金融开放度的比较	74
图 7.2	1980 ~2009 年亚洲和发达国家事实上的金融开放度比较	75
图 7.3	10 个亚洲经济体国际投资负债头寸	75
图 7.4	2001 ~2009 年开放程度与季度实际 GDP 波动之间的关系	83
图 7.5	2001 ~2009 年开放程度与季度实际消费波动之间的关系	84
图 7.6	2001 年开放度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85
图 7.7	2007 年开放度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85
图 7.8	全球不平衡	86
图 7.9	亚洲经济体外汇储备	86

第 1 章

背景：“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究其原因，“新区域主义”的悄然兴起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重要背景。

1.1 “新区域主义”兴起的事实

“区域主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一度流行。当时各发达经济体正经历着二战后的黄金增长期，急需扩大生产规模，拓展海外市场，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此期间，各发达国家均采取措施降低各自贸易壁垒来扩大世界市场，促进贸易流动。之后，由于关贸总协定（GATT）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断取得成功，各国政府对区域主义的兴趣逐渐降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区域贸易协定（RTAs）在亚洲各经济体和世界发达国家中再次蓬勃兴起，逐渐成为在各国政府中颇为风行的一项政策。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签订的 RTAs 的数量二次攀升。签订这些自由贸易协定（FTAs）和区域贸易协定恰逢各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已降至较低水平，全球化正如火如荼之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旗帜鲜明的 FTAs 和 RTAs 有别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区域主义，被称为新区域主义¹，其快速发展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特别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所代表的多边主义提出了挑战。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关贸总协定（GATT）在其存续的近 50 年中共收到 124 个关于成立 RTAs 的通报。而其继任者世界贸易组织（WTO）在 1995 年至 2006 年末的 12 年间收到了 244 个新增 RTAs 的通报。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报 GATT/WTO 备案的 RTAs 总数达到 474 个，其中 290 个协定已经生效。从这些数字不难看出，最近 10 多年来世界 RTAs 上升势头迅猛。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除了亚洲的蒙古、非洲的索马里和毛里塔尼亚）都与其他经济体签订了至少一个 RTAs。现阶段亚洲参与 RTAs 的数量仅次于西欧和美国。在发展中国家中，除了智利和墨西哥以外，亚洲是参与 RTAs 最为深入的地区。

值得庆幸的是，2007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世界贸易一体化进程并未像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一样停滞。这要归功于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亚洲地区）的明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7）将“新区域主义”定义为不同于传统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区域合作形式。它具有两个新的构成要素。第一，许多 FTAs 和 RTAs 将降低贸易壁垒与其他缔约方同意在诸如利用外商投资（FDI）的体制、政府采购、服务贸易以及竞争政策等领域实现自由化相挂钩；第二，参与新区域主义的国家人均收入、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别更大，且并不属于同一个地理区域。

智和大度。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由于国内经济困难而迅速抬头,受到国内游说和压力的欧美各国政府频繁发起贸易争端并实施了在数量和程度上前所未有的贸易救济措施。相比之下,亚洲各经济体大都坚守自由贸易和区域合作的原则,共同努力,抵制了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WTO 的数据显示,从 2007 年 9 月至 2011 年 1 月初,世界新实施的 RTAs 共有 43 个,其中 14 个是亚洲经济体之间发生的,占此时期全球新增 RTAs 总数的近 1/3。这些协定中的另外近 20% (8 个)的一方是亚洲经济体。亚洲经济在危机中能一直领跑世界并率先复苏,RTAs 功不可没。

亚洲在近 10 年中对“新区域主义”的

支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连之前倾向于多边主义的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都纷纷踊跃加入区域合作的浪潮。2000 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参与 RTAs 的平均数量为 1。日本和经济较为发达的“亚洲四小龙”地区并未如美国和西欧一样参与区域一体化:“亚洲四小龙”中的 2 个(新加坡和韩国)参与了 1 个 RTAs,另外 2 个(中国香港和中国台北)则与日本一样,未与任何地区签订类似协议(见图 1.1)。然而,截至 2010 年 9 月,亚洲主要经济体参与 RTAs 的平均数量达到 8 个,其中突出的有新加坡(20 个)、中国(12 个)、日本(11 个)、印度(11 个)、泰国(11 个)和马来西亚(10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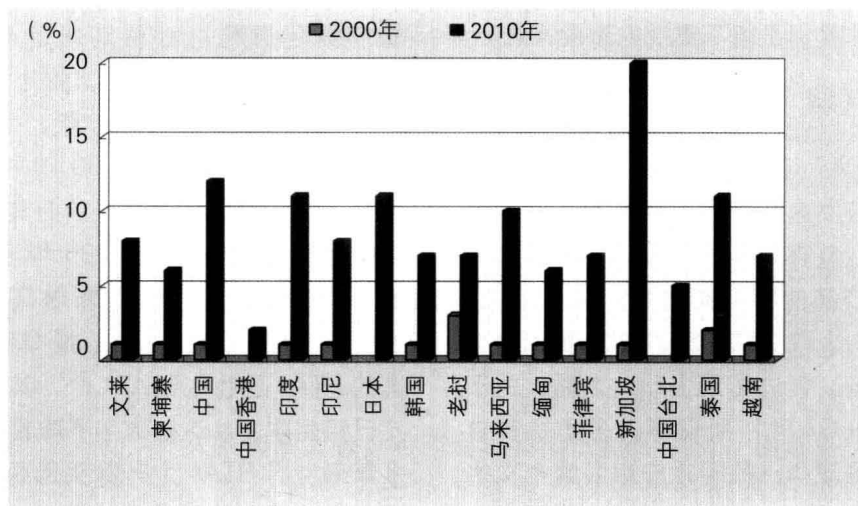


图 1.1 快速发展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数据来源: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区域融合中心(ARIC) FTA 数据库, (www.aric.adb.org), 数据截至 2010 年 9 月。

如图 1.2 所示,亚洲新签署的 RTAs 大大活跃了各经济体与自由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2000~2008 年,文莱与 FTA 伙伴之间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从 35% 上升到超过 75%,新加坡从 25% 上升到 60%,中国香港从零上升到 50%,韩国从 10% 上升到约 45%,中国从近 10% 上升到 25%。

新区域主义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区域主义相比有很多新特点。首先,“新区域主义”

包含了更广阔的地区和更多样化的经济体: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和地区不再只有发达经济体,新兴的发展中经济体也加入其中,而且承担了重要和最积极的角色。除了较大经济体外,小型经济体也开始签订新的 RTAs。通过 RTAs,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和小型经济体能够促进贸易、吸引外商投资,更好地进入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其次,为实现不同目标,很多经济体会同时参与多个

RTAs。鉴于多边主义进展不畅，而单一的 RTAs 又无法实现多样的目标，因此构筑多个重叠和相互交错的 RTAs 成为潮流。这也解释了传统上对区域主义向来保守的一些经济体，

如中国，为何现在对 RTAs 兴趣盎然。第三，“新区域主义”允许成员方保留其制度和组织结构，因而大大节省了协定谈判时间，能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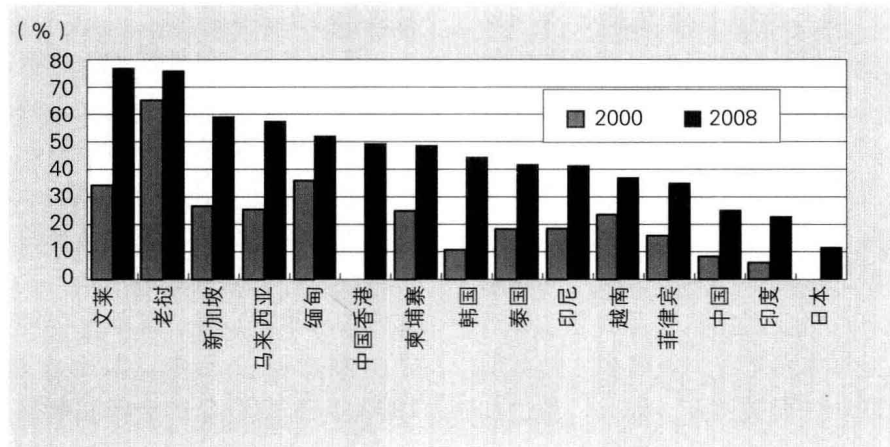


图 1.2 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与 FTA 伙伴的贸易比重

数据来源：Kawai 和 Geneshan (2009)

1.2 “新区域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区域主义”的兴起可以从以下六方面找到原因。

首先，GATT 前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促使缔约方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大幅降低。例如，在 1967 年的肯尼迪回合中，GATT 缔约方的平均关税削减了 50%；1979 年东京回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限制非关税壁垒；1994 年完成的乌拉圭回合将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从 6.3% 降低到 3.9%，降幅约 40%；此外，乌拉圭回合要求农产品出口国在六年内削减其农产品补贴总额的 36%，享受补贴的出口农产品数量只占 21%，10 年内全部取消对纺织品和服装产品的所有数量限制。发达国家进行 RTAs 谈判的出发点不再是追求 Viner (1950) 提出的获得更多贸易创造和避免贸易转移，其他目标如争取投资优惠以及获取资源等变得更为重要。

其次，发展中国家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看到开放经济、吸引外资、鼓励出

口对国内市场开发、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技术水平和促进综合国力的重要作用。众多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开放本国市场，对 FDI 的态度也有了新变化：从过去的恐惧和抵制转变为鼓励贸易和 FDI 自由化。这些经济体纷纷效仿“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型和外向型发展战略，进行改革，开放市场，并争取资金和技术，通过学习提升自身竞争力。拉美的很多国家以及亚洲的中国、印度和越南都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形势下，全球化的观念深入人心，发展中国家也在 WTO 框架下纷纷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在 WTO 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得以降低，不过由于取得的降幅已经非常巨大，未来几乎鲜有继续下降的余地。

第三，由于 GATT 签订后各种贸易壁垒已显著降低，WTO 新一轮谈判的焦点集中在之前 GATT 各轮谈判未能涉及的议题上，如农业补贴问题、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和环境问题。新一轮 WTO 多哈回合谈判中将把这些议题包括在内，不过该轮谈判到目

前为止已历时 10 年，仍然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WTO 各成员方对多边主义的信心。

第四，20 世纪 90 年代初拉美金融危机和 90 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暴露了这些国家增长模式的弱点：10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投入、技术和效率的提高以及后起追赶效应，但这种增长模式由于缺乏创新性和效率的持续提高而变得难以为继。因此，采取开放和增长策略的新兴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一定外在因素的催化下，必然出现不同程度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危机一旦到来，邻近区域的新兴经济体通常因为经济模式的类似和经济金融联动性而被波及。因此，通过加强区域内协调对于保持各经济体的稳定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发展与本区域经济密切相关的区外经济体合作可以降低不利冲击的影响。另外，与区外发达经济体长期的贸易、金融和投资合作可以保证新兴经济体获得海外市场和外国投资，最大程度地降低来自区域内或区域外的不利影响。

第五，随着新兴发展中经济体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生产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这使得生产环节开始发生国际转移：标准化的低技术型生产，尤其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被转移到相应的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而在新兴经济体获得的原料和经过初级加工的中间产品需要再返回发达国家进行最后关键环节的加工和销售。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对庞蒂亚克·莱曼汽车（Pontiac Le Mans）的生产环节进行报道：其设计在德国完成，发动机为澳大利亚制造，轮胎及电气设备制造商在韩国，无线电设备由新加坡提供，车身板材是日本制造，美国只提供变速器，最后的组装在韩国完成，然后销往世界各国，包括运回美国本土。这样的全球化垂直分工模式几乎已经在每种工业制造品上得到运用，生产各环节在世界不同地区进行，使生产可以获

得最大效率、最低成本和最高质量。而地缘的邻近可以为垂直分工节约运输成本，也更利于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沟通。在承担相邻生产环节的地区之间建立 RTAs，是世界生产环节垂直化分工的强烈需求，也可以进一步推进垂直分工的深化。

亚洲各经济体地域相近、资源互补、文化相似，是全球化垂直分工必不可少的核心区域。Wang、Powers 和 Wei（2009）对亚洲九个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尼、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台北）的研究显示，除了两个国家（新加坡和菲律宾）外，其他七个经济体出口美国的制造业产品中，本地含量的比重在 1990 年至 2000 年的十年间都有所下降，其中马来西亚下降了 17.7%，中国台北下降了 9.1%，中国大陆下降了 4.7%。另一方面，除了三个经济体（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北），其他六个经济体出口美国的制造业产品中来自东亚其他地区的中间产品比重在这十年间都有所上升，其中马来西亚出口美国的产品中来自其他东亚地区的中间产品比重上升了 10.1%，中国大陆上升了 4.8%。可以看出，1990 年至 2000 年十年间，亚洲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在提高，其内部垂直分工的程度也在加深。这也要求上述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及其与外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六，从学术界来看，由于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新区域主义”对经济和福利的提升超过其负面作用，经济学家对 RTAs 的观点变得比之前更为积极。传统理论对 RTAs 的不确定看法和顾虑主要源于 Viner（1950）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理论，而 Grossman、Helpman（1995）和 Krishna（1998）的理论研究给人们传递的主要信息是由于 RTAs 通常是政治上（非社会经济福利）的考虑，因此贸易转移效应大于贸易创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给世界带来负面影响和阻碍全球一体化的可能性更大。但是，